

西 游 记 漫 话

林庚 著

目 录

总 序	袁行霈	5
导 读	陈平原	11
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		3
一、关于大闹天宫情节的分析		3
二、说“反了”		6
三、“可能”与“不可能”		7
《西游记》漫话		12
从菩提祖师谈起		12
天上人间		14
江湖风波		31
取经记与闹天宫		52
喜剧角色		65
动物王国		86
童心说		92
童话的天真世界		97
结语		111
“赤壁之战”分析		115
《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新的意识形态的萌芽		123
一、《红楼梦》反封建的深度		123

二、关于男女平等的问题	127
三、恋爱主题面对整个社会现实的问题	129
四、在新的意识形态中贾宝玉所表现的性格形象	131
五、《红楼梦》中新意识形态的前后踪迹	133
后记	135

总 序^{*}

袁行霈

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

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换到 62 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

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摆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有转播的时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就在这次

*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原题为《燕南园 62 号——记恩师林庚》。今征得袁先生同意，作为本丛书总序。

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还喜欢唱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能唱到高音 C。大概是得益于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还画过一幅头腔图，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灌向鼻腔和口腔，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

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其实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静希师还有钟芸师、一新师兄都去听课，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一个玉雕的水盂，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瓷的。在书房里，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当然多的还是学问，屈原、李白、《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外国的文学，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谈到水分，他说如果没有水分，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红楼梦》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水葱”似的，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那年我才26岁，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选注过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诉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选，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

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写得特别好。特别是“眼枯即见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细体会，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又如，他说杜甫的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过去的解释不妥。三峡中的巴峡在下，巫峡在上，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证明这首诗中的“巴峡”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因为在巫山中间，所以又称巫峡。经老师这样一讲，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

回想起来，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一种鉴别的眼光；还教给我一种方法，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搜寻我的记忆，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厉言疾色，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从不当面夸奖。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但我请他为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撰序的时候，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在短短的篇幅内，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并对我书中的内容，提要钩玄略加评论。其论述之精当，语言之隽永，口吻之亲切，气度之潇洒，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

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说：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可惜我未能做到。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

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 51 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

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
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
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
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

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金色的网织成太阳
银色的网织成月亮
谁织成那蓝色的天
落在我那幼年心上
谁织成那蓝色的网
从摇篮就与人作伴
让生活的大海洋上
一滴露水也来歌唱

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要用现代的语言，创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诗行。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真该学习写新诗！”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

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

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颂精神的创造力，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灰烬”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

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其特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对静希师的《中国文学史》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关于《天问》是楚国诗史的阐释；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盛唐气象”的精彩发挥，以及关于李白“布衣感”的揭示；关于《西游记》文化内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许多见解，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楚辞》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但仍处之泰然，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

来检验的。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

静希师在燕南园 62 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

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

2004 年 9 月 25 日

导 读^{*}

陈平原

作为现代中国有数的著名诗人，林庚先生 40 年代起转治中国文学史。不难想象，一般读者对其著述的期待，大都集中在诗论部分。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并非毫无来由。从最初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到日后逐渐学院化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唐诗综论》，其中最精彩的，确实多属诗论（如关于“兴亡史诗”以及“盛唐气象”的论述。）

这就难怪，当燕园里纷传林先生正在撰写有关《西游记》的论著时，朋友们大都只是作为逸闻，并没真的在意。直到接获赠书并仔细拜读，方才大吃一惊。如今书已问世八年，好几次想向读书界郑重推荐，只是苦于无从落笔。这不是一般的专业著述，而是诗人“用心”写作的大书，必须排除杂念（包括所谓的“学术通则”），同样“用心”去体会，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

除去三则旧文，主体部分的《西游记漫话》，只有七万馀言。在动辄数十万字的当今学界，这只能算小册子。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潜把玩，含英咀华，然后自说自话，根本不理睬业已成型的众多“体系”。其论说姿态，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行吟诗人，或孤独的散步者。

作者立说的根基，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西游记》是一部富于童话性的小说。”这本不算创见，从胡适起，不断有人谈及此书

^{*} 本文原系陈平原先生撰写的书评，题为《诗心与童心——读〈西游记漫话〉》，今征得陈先生同意，作为本书的导读。

的游戏性质与童话氛围。问题在于，早已心智成熟的学者们，与童话的天真烂漫格格不入，很难深入体味。林著之卓尔不群，说到底，缘于作者沉醉其间，故别有会心。

作者历来喜欢童话，就连与童话相关的各种动画片，也都令其入迷。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读《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众多可爱的小妖怪，不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在《后记》中，作者称：

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

不是因为专业研究的需要，纯属压抑不住的好奇心，以及对老朋友的感激之情，促使时已退休的诗人林庚，突发奇想，大谈起小说来。

对细节的熟悉以及对人物的体贴，使得林著信手拈来，皆成妙章，此尚在其次。称孙悟空、猪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调侃戏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喜剧性冲突，乃“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据，又可能与取经故事经历过的戏曲化过程有关”（113页），因“中国古代的戏曲，从唐参军戏到宋金杂剧和院本，一直都具有较多的调笑滑稽的色彩，插科打诨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68—69页）；或者从明代的社会思潮中寻找“孙悟空自由不羁、超越一切束缚的精神状态”之由来（96页），尤其注重李贽的“童心说”，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虽也精彩，但别的文学史家也能做到。

最能体现论者性情，也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其实是“童话的天真世界”一节。作者着重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游戏的意味，二是小妖的功能，三是即兴式的花样翻新，并断言三者皆指向儿童的心理特征。

在作者看来,按阶级斗争观点解读《西游记》,不能说全错,但难尽得其神髓。不是说其中没有正邪之争,也并非抹杀孙悟空与众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别,而是小说中许多精彩场面,无法单纯以“正义战胜邪恶”来解读。

作者认定,《西游记》中孙悟空“所以那样轻松自如,胜任愉快,正因为他将这一切出生入死的经历都看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已”。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生而复死,死而复生,也全凭一时的需要和兴致”(99页),就好像小孩捉迷藏,彼此间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险。成人读者普遍过于认真,非努力发掘争斗之微言大义不可;可孙悟空与妖魔以及诸天神的角逐,常带有游戏意味。比如,与二郎神追逐,土地庙外树起了旗杆;钻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树蜻蜓,翻跟斗——这些都属于顽童的恶作剧。此类争斗,实为游戏的延续和发展,其中含“天真的情趣与幽默的态度”,“不能看得过于认真,看得过于认真了,便不免大煞风景”(102页)。

与习惯忠奸对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维方式不同,在注重游戏的儿童世界里,不少对立是可以消解的。如与孙悟空处于对立地位的小妖,其天真烂漫仍能赢得儿童的喜爱。同样摹写战争场面,《西游记》的特出之处在于,无关紧要的小妖占相当的篇幅,且给人留下生动的印象。那撞上厅来通报消息的小妖,先“把个令字旗磨一磨”;还有那“敲着梆,摇着铃”,口中念念有词,实则有口无心的巡山小妖,一如快乐的儿童,其调皮与稚气,都让人忍俊不禁。在林先生看来,如类场面,“对立的双方最终都统一在童话的天真烂漫的情调中了”(108页)。

《西游记》以想象力丰富著称,可小说中有许多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读者竟不加追究,认可其依情境的转移而改变人物降妖伏魔的本事。孙悟空有时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有时又降到凡人的层次,陷入本不该陷入的困境。作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童话的积极因素,“造成了《西游记》中想象的创造性与无限

性”(110—111 页)。假如严格按照成人的逻辑,孙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经,该易如反掌才是。要真是这样,小说还有什么可看?

《西游记》的好处恰恰就在于写出了孙悟空层出不穷的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行为从不落于一种格式,你无法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些什么。他的行动中充满了即兴式的花样翻新与尝试。(110 页)

童话中的想象,不必讲求合乎逻辑,此乃情节千变万化的前提。反过来说,读者之认可孙悟空忽大忽小、忽圣忽凡,正是默认了小说中“所包含的童话性”。

林著之解说《西游记》,选择了儿童的视角,以“童话性”作为立说的根基,有学理上的考虑,但更与作者的个人兴致相关连。极度的好奇心、无边的想象力、以及对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诗心,更属于保持童心的诗心。

1998 年 8 月 9 日于石河子

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

《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中心，曾被肯定为是反映农民起义的，这肯定，给全书前七回之后的九十三回带来了纷纭无定的解释；把一部完整的作品弄得一刀两断地割裂开来。尽管如此，前七回的论断是不容怀疑的，具有总结性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至使得封建统治者不能维持或者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总之，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的产生，如果不是建立在历代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或者说其中心不是反映农民起义，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为什么“不可能”呢？却从来缺少分析和解释，这就使得这个结论虽然说得十拿九稳，却并没有多少把握。现在我们先就大闹天宫的情节作一点初步的分析。

一、关于大闹天宫情节的分析

首先通过孙悟空的性格、形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这分析一开始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是不利的。孙悟空的性格与封建社会里的农民有着显著的差异。农民热爱自己那块土地，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愿意离开它去，所谓“安土重迁”乃是农民所具有的典型性格。同时农民的思想意识，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之下，是向往于无剥削的葛天氏之民的生活的。《西游记》中花

果山的描写，就正近于那样一种生活，可是孙悟空却并不安于那种生活，他偏要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去寻求他的理想。孙悟空的离开花果山并不是由于兵燹灾荒或者其他不得已的情况，而是如《西游记》所叙述的，正在：

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

所谓“享乐天真”，“喜宴之际”，放下了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却要漂洋过海走遍天涯，这是封建社会的农民的性格形象吗？这是符合于封建社会下农民的典型意识吗？然而这个远涉重洋却是美猴王成为孙悟空的重要情节，没有这个情节发展，也就没有了大闹天宫的下文，可是这个情节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却是不利的，对于说明西天取经反而是有利的。因为孙悟空既能克服种种困难访道于三星洞，为什么不能经历种种磨难取经于西天呢？这里有着性格上的一致性。可是西天取经却正是被认为与农民起义是不一致的，然则这带有一致性的孙悟空的性格，对于说明反映农民起义就显然是不利的了。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来分析大闹天宫本身的情节，这里我们先从大闹天宫的起因开始。那么大闹天宫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如历来农民起义的发生，是由于花果山的洞天福地变得民不聊生了吗？或是由于天宫对于花果山的猴子们强征徭役，重加赋税，以及有其他类似情况的压迫吗？可是这些在大闹天宫的前夕都找不到。大闹天宫的发生一共两次：第一次由于请孙悟空到天宫去，却给了他一个未入流的弼马温的官职，孙悟空发现玉帝如此看不起他，于是大闹了天宫，而且孙悟空从此终身恼恨听见弼马温三个字，这里应该说贯穿着有孙悟空的典型性格与思想意识，可是这是起义农民的性格形象与思想意识吗？然而这正是第一次大闹天宫的起因，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原因。第二次大

闹天宫是由于孙悟空虽然做了齐天大圣，也有了齐天府，可是却没有请他赴蟠桃会，这样的事情跟农民起义就更难联系上了，可是这一次闹得却比上一次更凶。有人说官封弼马温以至于齐天大圣，都是统治者的怀柔政策，可是怀柔政策也是多种多样的，怎么一被怀柔就一定是农民起义呢？汉高祖曾经怀柔过韩信，韩信要做齐王汉高祖就封他做齐王，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可是韩信能算是农民起义吗？然则两次大闹天宫的起因，与农民起义都是难得有把握能够联系得上的。

大闹天宫的战争场面乃是孙悟空与天兵天将们的对抗，这是被认为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可是在这个战争中，尽管天兵天将是那样多，而孙悟空却出色的是一个单干户。因为那些花果山的猴子们根本就到不了天宫，所以也根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我们几曾看见有农民起义战争是一个人单干的？这就更没有把握了。农民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群众，所谓“登高一呼，揭竿而起”。而孙悟空所依靠的是他的七十二般变化与一根如意金箍棒，此外还有的就是一身毫毛会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若说这千百个小孙悟空就算是代表起义的群众，那么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空也老带着这一身毫毛，而且随时可以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也就无时不是在起义之中了，这说法也是没有人会同意的。

然则大闹天宫的情节，从起因到整个战斗的分析，哪一件可以让我们满有把握地认为它是反映了农民起义呢？

也许有人会这样想，既然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过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那么什么作品能拒绝受到它的影响呢？我想大概并没有什么作品会拒绝这种影响，而且影响如果不论大小，不论间接直接，那么也总是会有的。可是一则影响并不等于反映，二则影响并不都是决定性的，例如著名的小说《金瓶梅》与《西游记》，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我们并不说《金瓶梅》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为什么同时代的《西游记》就非是不可呢？这里我们所真正需

要的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具体情节的分析。现在就要接触到另外一个有兴趣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反了”。

二、说“反了”

原来《西游记》第四回里有这样的话：

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宫去了。

第五回上又有这样的标题：“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可见大闹天宫确实是“反了”，这也许正是那满有把握的最后理由，可是这也仍然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仅仅是“反了”也还不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小说说起，例如《水浒传》里有宋江吟反诗，这是“反了”，《封神演义》里就又有苏护吟反诗，这又是“反了”，同是吟反诗，同是“反了”，能说都是农民起义吗？至于历史上的“反了”，则更是不胜枚举，例如《左传·庄公八年》：

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

结果杀了齐襄公。这是由于戍边日子久了而“反了”的。《左传·襄公十四年》：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于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圃；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

结果孙文子作乱，卫献公奔齐。这是由于国王召宴，到时候又不给饭吃，并且简慢无礼而“反了”的。襄公二十五年：

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户出。公拊盈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